

李兰琴 著

汤若望传



96651

B979.911.6

2

汤 若 望 传

李兰琴 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立群

装帧设计:肖 辉

版式设计:朱 强

责任校对:智福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汤若望传/李兰琴著.-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5.4

ISBN 7-5060-0578-6

I. 汤…

I. 李…

II. ①汤若望-传记②传教士-传记-德国

N. B979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5515 号

汤 若 望 传

TANG RUOWANG ZHUAN

李兰琴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*

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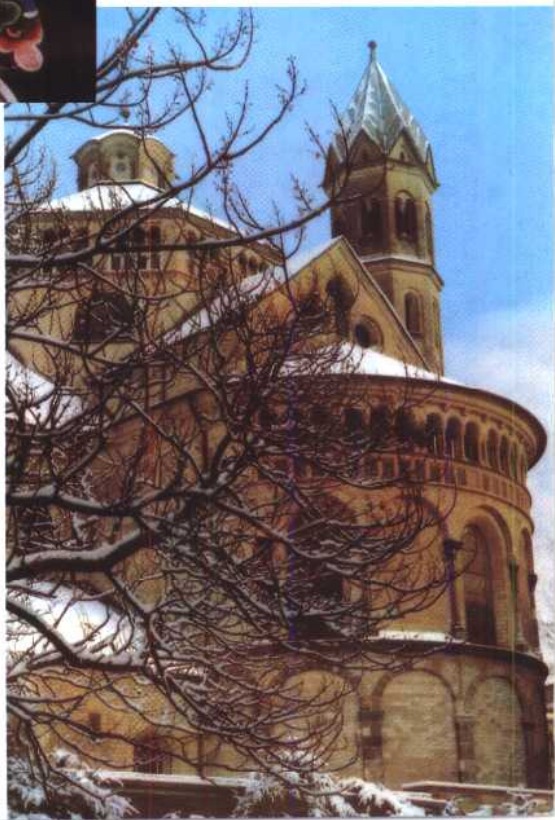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25 插 2

字数:150 千字 印数:1-4000 册

ISBN 7-5060-0578-6/K·130 定价:9.50 元



汤若望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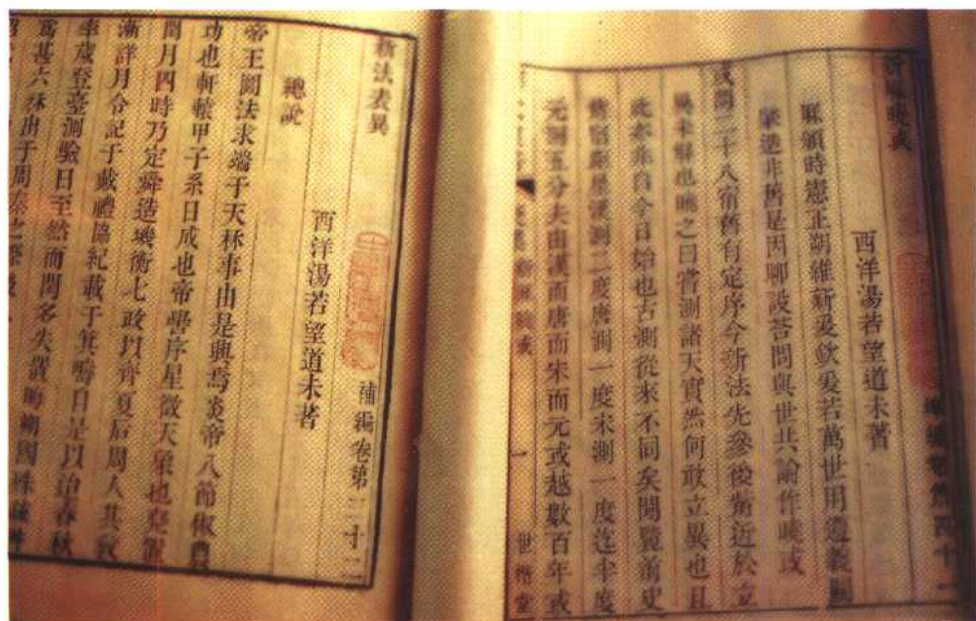
德国科隆城阿波斯特尔教堂

汤若望墓
(北京阜成门外)



北京古观象台内汤若望原工作处

中国青花方瓶
(汤若望后裔收藏)



汤若望著《新历晓惑》

風動鈴旌樹彩斜，清高秀髮儘堪差。他山鳥獸諸侯會，異國珠璣帝子家。
可道天樞通海眼，姑知日路小瓜窪。當時占繭探西極，浩氣崑崙有青涯。

殊方別自有烟霞，一葉艤艤此外觀。地折流沙繁品物，人窮沙漠渺波瀾。
看同藥色三光納，運裏龍形萬壑寒。水向橫官延受籙，知君定不怯瓊丹。

八馬遺程並菊中，如雲弟二向鴻濤。溢懷除疇昔，風息屢傳那。難瘳瘡痍室，
靈堂旋時回物。痛小術齊後代，天工此厝剩有畏。生設一設擺，鬚鬚遇老風。

圖書先同如攝，行行殊層閣。揖身傳別令，必映羣。在下間臥，情遊古史。昔
琴瑟中和，物奏銀鑄光。怪夜雙懸火，送龍拂。龍霧液，不恐寓事。泛海煙。

道志先生學通天人養，多主秘心。服其焉人中，龍象也。于曾過訪，先生亭上。

登覽聞海外諸奇，圖書此示。正知道，而必大受也。河南王鏐。

前 言：重悼芳踪

重悼芳踪，这“芳踪”两字，出自清康熙八年皇帝赐汤若望的祭文，镌于其墓碑上。当时，康熙皇帝亲自派遣官员到汤若望墓前致祭，追悼“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”。汤若望被这位清代皇帝誉为“鞠躬尽瘁”之臣，对此，他是当之无愧的。而且他四十余年在华生涯的价值，已经超出了帝王忠臣的范畴。

汤若望原名约翰·亚当·沙尔·冯·贝尔(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)。1592年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城。年轻时到罗马修神学并加入耶稣会。17世纪20年代来中国传播他的信仰天主教。1666年在北京去世，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。

“历史喜欢作弄人，喜欢同人们开玩笑，本来要到这个房间，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。”汤若望志愿到中国弘扬天主教，甚至想使中国社会上层要人乃至宫廷显贵皈依天主教。然而，中国士大夫乃至崇祯、顺治、康熙三位帝王更为赏识的却是他在西学上的造诣与才能。因而早在明代他就被荐入历局，与中国同行一起从事撰写崇祯历书等工作。清朝初年，他又受顺治皇帝之封，出任通政使司通政使，掌管钦天监印务达20年之久，最后被封为光禄大夫，仕到一品。他在观测天象、制造仪器、修历治历以及掌管钦天监行政事务上均作出了突出的成绩。与此同时，他与中国朝野广泛建立了密切而融洽的关系。这更促进了他在传播西学方面的成功。结果：

“若望谈道之名，反为其历学天文所掩。”（陈垣语）——所以说，历史更改了他在华事业的主航线。而历史也公正地记下了他的贡献，确立了他西学东渐潮流中的突出地位，使这位早期来华传教士，成为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。

没有文化交流，人类文化就无法进步。

德国伟大文学巨匠歌德曾指出：西方学术传统所固有的那种兴致勃勃的，但也是破坏性的“浮士德式的求知欲”，应该由中国人对待自然的那种“永久的女性气质”来加以补充。李约瑟博士进而认为：欧洲的科学传统可以比之于“自然力阳”，那么，中国的科学传统就可以比之于“自然力阴”，这两种传统，正如这两种无所不在的自然力一样，并不互相否定，而是存在着互相补充与互相吸引的倾向。

那么，两种传统又是如何才能发生碰撞，产生交融以至实现相互补充呢？这首先需要人，需要文化邮路的开拓者。这样的人是鸿雁，是桥梁，是人类文化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使者。然而，并非任何人都能承担这种重任，它要求有两种文化的高度素养，要求有非同寻常的理解力、适应力和活动力，要求要以非同寻常的韧性和耐性，在东西天地间不倦地求索，才能有所成功。纵观汤若望一生，正是这样一篇生动的写照。他四十年如一日，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精神，耕耘于中国的土地上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哺育了他，使他在这块土地上扎住了根基，结出了果实。或者说，汤若望这个人物本身，就成为中西文化相融而产生的一枚果实，所以很有特色，很富于内涵，这也许是对他的研究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。

1933年，德人魏特曾著有《汤若望传》一书。16年后有了中译本。笔者有幸见识了魏特神甫的大部手稿和初加工的原始资料，从中看到他研究传教档案所花的巨大功夫。魏氏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神甫的信念出发，通过回顾汤若望在履行耶稣会使命中的曲

折经历,赞颂其会先行同志传播福音的奉献精神。

此后六十余年中,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过种种研究。这期间,中外历史的长河几经掀起惊涛骇浪。汤氏的荣辱声名随之沉浮,对汤的研究评述也不可避免地随之留下历史变迁的烙印。

当前,在中国疾步走向世界的大潮中,重新探讨汤若望其人在中西交通史中的价值,对文化交流的继往开来,可能会有所裨益。正是从这点出发,笔者拟作一“重悼”的尝试,因而在汤氏曾生活过的几个城市,作了寻踪考察,走访了学者、学术机构和汤氏家族的后代,查阅了有关历史文献。在撰述中尽可能借鉴这年中外研究者的诸多成果,使用佚散于中外的不少历史资料。笔者是以世俗的眼光,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,再作传述的。希望通过这些努力,使汤若望的形象更完整、更丰满地呈现于当代读者的面前。

往昔的文化使者给我们以启迪,未来世界文化交流的需求向我们召唤。当今时代的脚步有如驰骋在高速公路上,世界相形变小了,人民的接触、文化的交汇更多也更易了。一个中国与外界更广泛、更频仍、更密切的交流浪潮亦将来临。对于她,我们不仅愿像观海潮者那样兴趣十足地翘首企望,而且应为她的到来尽一点微薄之力。

这也是笔者“重悼芳踪”的初衷。

本人在完成这部书稿时,曾得到多方的帮助,在此一并致谢:

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鲍尔教授(Prof. Dr. Wolfgang Bauer)、魏斯教授(Prof. Dr. Eberhard Weis)和莫克博士(Dr. Walter Mogk)给予的指导和关怀。感谢德国汤若望协会多位对中国友好人士、特别是主席泰森先生(Hansjosef Theyßen)以予的友好情义与支持。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科学院图书馆、德意志博物馆、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和首邑档案馆等图书资料机构

提供的方便。

没有东方出版社的支持,本书的问世是不可能的,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责任编辑刘立群先生的鼎力相助和融洽合作。请他们亦接受作者的真诚谢意。

由于本人水平能力有限,书中错误、疏漏之处在所难免,敬希中外读者、同行与专家不吝赐教!

目 录

前 言：重悼芳踪	(1)
第一章 欧洲岁月	(1)
第二章 造炮小史	(18)
第三章 传播西学	(31)
第四章 交游中士	(65)
第五章 清天子与洋“玛法”	(93)
第六章 中荷初交中的“通事”	(115)
第七章 传布教义	(125)
第八章 冤狱与昭雪	(146)
附 录 汤若望生平年表	(181)
主要参考书目	(188)
档案资料	(192)

D121/21

第一章 欧洲岁月

16 世纪,欧洲正处于一个风云多变的时代,政教之争,疆土之争,宗教之争,社会发展的新旧交替之争交织进行。德意志更是经历着历史上的多事之秋。踏上处于欧洲中部的德意志土地,便有如进入小国的丛林。四百多个诸侯国同时并存,这种离析分崩的局面,决定着它在政治势力上必定是一盘散沙。德意志皇帝与教宗的矛盾日渐趋于尖锐化。但德意志没有形成足够的凝聚力,没有类似英法式的君主政权借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,社会下层对罗马教廷的积怨便构成潜伏的危机。那时,不少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生活腐化,巧立名目,索取金钱,激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不满。1517 年,发生了马丁·路德(Martin Luther, 1483—1546 年)领导的宗教改革。路德勇敢地将自己提出的 95 条改教论纲公诸于世,从而对旧教提出公开的挑战。路德的改革影响远大,此后曾波及斯堪的纳维亚的瑞典、丹麦、挪威、冰岛等国,新教因之在那里形成国教。路德的誓反即抗议精神对德意志贫苦农民也起了召唤作用。与此同时,新兴工商产业的发展使一些市民较快地致富,而下层劳动者却受到残酷的剥削,普通百姓挣扎于贫困的生活之中。农民倍加受到破产与饥馑的威胁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爆发了 1523—1524 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。这一运动声势浩大,群众性强,当时百姓中约有 4/5 的人参与。但它后来遭到残酷的镇压,死亡者高达 10 万人。马丁·路德面对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,暴露了其固有的局限性。他

“动摇不定，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，终至投效诸侯”^①，也主张无情地鞭笞与屠戮起义的农民。一场德意志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被凶暴地镇压下去。农民仍处于被盘剥、被鱼肉的惨状之下。他们对路德及其改革感到失望，许多人又因而返皈旧教。

1530年，新教的拥护者们在奥格斯堡聚会，提出了二十八项信条，史称奥格斯堡信条。但天主教与改教者达成协议的希望落空，两者间的分歧反而更加势同水火，从而酿成了德意志内部新的冲突。直到1555年签订了奥格斯堡条约，才暂时平定了局势。此后，世俗的统治者有权调整其管辖境内的宗教事宜，因而形成了“在谁的领地，信谁的宗教”这样一种原则。

到16世纪末，欧洲的教会基本上是南部以天主教为主，北部则以新教为主。除此基本布局之外，便常以统治者的宗教信仰为转移了。

位于德意志莱茵地区的科隆，虽已临近北疆，但它是神圣罗马帝国晚期最古老的大主教区之一。1582年，盖哈德·冯·瓦尔德堡主教曾试图使科隆改奉新教，从而引起了历时三年的科隆之战（1582—1585年）。结果教皇与皇帝共同将这位主教罢免，在巴伐利亚与西班牙军队的共同保护下，巴伐利亚大公爵恩斯特继任其职。因而此后科隆与巴伐利亚、法国、西班牙保持了良好关系。在科隆地区，天主教的优势也长期得以维护和稳固。这一地区的许多望族，也是世袭的虔诚天主教信徒。

正是在这幅历史帷幕的陪衬下，汤若望降生于人间。

1592年5月1日，他出生于德意志莱茵兰地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之家，命名约翰·亚当。而这个世袭的贵族家庭姓沙尔·冯·贝尔，因而他的全名为约翰·亚当·沙尔·冯·贝尔（Johann

^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7卷第419页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。

Adam Schall von Bell)。“汤若望”这个名字,是他后来抵达中国后,出于入境随俗的缘故,才另取的汉名。因为 Adam 听起来与中国的姓“汤”相似,而 Johann 这个西名,以前大多习惯地译为“若望”。这便是“汤若望”三字的由来了。但我们在叙述他来华之前的经历时,自然以使用亚当·沙尔这个名字才更准确。

对于他的生辰年月,有两种说法:除上述 1592 年之说外,还有人认为他系 1591 年诞生。但笔者以为第二种说法没有太多根据。他年轻时求学的罗马日耳曼学院,在这一问题上留下了可信的依据。在学生登记册的亚当·沙尔·冯·贝尔名下注有:“1608 年 5 月 1 日,方始 17 岁。”那所学校对学员年龄的要求很严格,正因为亚当·沙尔当时年龄偏小,所以他的入学申请一度被校方严肃驳回。这一登记档案,现在恰恰成了查考他出生年月的证据。

那么,约翰·亚当·沙尔出生在什么地方呢?这个问题却已成为有关他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难以解开的疑团了。魏特所著《汤若望传》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:“约翰·亚当·沙尔是于 1592 年 5 月 1 日生于科隆城内阿波斯特教堂近处的爵邸中。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新市场街 47 号和伊木·拉赫(Im Lach)街 16 号房宅之所在。”^①

对上述说法,现在却出现了极大的争议,特别是沙尔—利奥柯尔家族的后裔中,出现了否定的意向:如维德里希·沙尔—利奥柯尔伯爵先生认为:亚当·沙尔并不是出生在上述地点,而是生在其父母当时所居住的吕符腾贝格(Lueftelberg)城堡之中。这个小镇位于科隆城远郊,由于地僻而幽静,有如一处世外桃源。为了寻访亚当·沙尔的遗踪,笔者曾两抵风景宜人的吕符腾贝格,不仅目睹了古老城堡的风韵,也聆听了沙尔后代的叙述。因为无论亚当·沙

① 参见魏特《汤若望传》德文版第一章,注释 12,第 4—6 页。

尔呱呱坠地的时刻是否在此古堡中，要寻他在德国的根，这里该是必谒之地，因这城堡曾是他家当时的大本营，也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沙尔家族故居。

“吕符腾贝格”一词，其德文原意有风凉之山的意思，顾名思义，这是个有韵味的山庄。它位于莱茵—西根一带，从现今的行政区划分讲，辖属于梅肯海姆城。这地方虽并非闻名遐迩，但它历史悠久，早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就已开拓，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重要，正处在当时帝国直辖的特里尔城通往波恩的交通要道上。沙尔家城堡四围的小小护城河，也与科隆城那时开掘的水渠一脉相通。小镇周围风光憩静，树绿荫浓。17世纪时，村内不过20多座屋宇，星星点点散落于山谷之中。那么这座城堡显然曾是鸡群之鹤了。虽然它几经易主，所幸各届主人都精心地保护了它，因而使它迄今古韵犹存：铁灰色的瓦顶，正黄色的墙壁，用绳索拉起的小吊桥，这一切在浓绿林木的烘托中，更显出一种独特的古典之美。城堡正前方左右两角，各有一个桥头堡式的圆柱型小楼，楼顶酷似骑士的钢盔：顶端一个铁尖尖，似增添了几分威武，使它们好像两名武士，威严地守护着这个古堡。从古城堡行不远，便可见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教堂，系14世纪最后建成。这在当时无疑是沙尔一家经常作弥撒的地方。为了缅怀亚当·沙尔神甫——这位家乡哺育出的名人，教堂特别在墙壁上镌刻了一副汤若望身着清代官服的像，像的线条极简单，形象却清晰而逼真。

无疑，他是家乡的骄傲。他和兄弟们及父母等曾一起生活在这小镇上。在科隆城里新市场附近，确实也曾有过他家的一幢住房。据悉比起城堡要相对简陋、狭小了，可惜遗迹已荡然无存。那么亚当·沙尔到底是生在哪处宅中呢？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要凭推断与分析了。产褥中的贵族太太沙尔会不会离开城堡中的那个设备齐全、环境安宜、仆人诸多的长居之所，而偏安于城里的小住宅

之中呢？维德里希·沙尔—利奥柯尔伯爵先生认为不可能，他说：他认为亚当·沙尔神甫确是生在古城堡的，而且少儿时代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度过的。可能在就读三王冕中学时，曾住在城里宅中，因为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，他们若进城，往返需乘坐马车，这有几十公里的路程，不可能每天来来去去地奔波。而假期之中，亚当和他的兄弟们仍然是在吕符腾贝格美丽的山庄度过的。

在南怀仁笔下，关于亚当·沙尔的出生地是这样记述的：他是“在科隆附近出生的”。南怀仁与汤若望多年朝夕相处。他的见解颇具参考价值。

但沙尔家族后裔中的另外一些人，如年逾八旬的玛丽娅·卡布里埃·沙尔—利奥柯尔伯爵夫人(Marie—Gabrielle Gräfin von Tattenbach Schall—Riaucour)曾对笔者说：这位先祖恐怕是生在科隆城里，她说：乡下医疗条件不佳，医生大多在城里行医。况且，4月底还是乍暖还寒时节，还有些清凉。沙尔太太自然是在城里分娩，才更合乎情理，那时贵族家庭大多在夏季才去城堡中避暑。她的见解当然也有一番道理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样的考证意义不大，但是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：要立一块“亚当·沙尔诞生地”的纪念碑，到底该放在什么地方呢？几年前曾有热心于中德交往史的人，把这样一块牌子挂在了科隆城新市场街附近的路口，新闻媒介也作了报道。但鉴于沙尔家族后裔的不同意见，只好又把牌子取下来！我们期待找到更可靠的历史资料，以帮助我们拨开这团疑云。

迄今所能了解到的沙尔家族的历史，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。那时他们是该地区的望族，具有比较显赫的财产和声誉，如今我们还可以看到沙尔家族的族徽。从迄今掌握的材料看，这一家族标志最早出现于1350年。那时期，他们家中涌现了勇敢善战的骑士，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并渐有名气。到16世纪，族中出现了两